

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系列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转型经济理论研究

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

热若尔·罗兰

道德风险、监控成本与合约选择

约伦·巴泽尔 孙永泉

产业结构、就业与经济增长

臧旭恒 孙文祥

技术冲击下的股价变动与经常帐户调整

——开放金融经济的动态均衡分析

孙烽 孙颖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的生产率

索玛琳·加罗蒙特·吉莱妮 华萍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新趋势

——一个基于金融监管效用假说的解释

李宏瑾

中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的实证研究

夏新平 余明桂 汪宜霞

5



南京

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系列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5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大商学评论/刘志彪、郑江淮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305-04415-6

I. 南... II. 刘... III. 经济管理—文集
IV. F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830 号

书 名 南大商学评论(第 5 辑)

主 编 刘志彪 郑江淮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270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415-6/F·573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大商学评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赵曙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志彪	刘厚俊	刘 洪
	杨 忠	杨雄胜	沈坤荣
	张二震	陈传明	范从来
	茅 宁	赵曙明	施建军
	洪银兴	陶鹏德	鲁明泓
	裴 平		
主 编	刘志彪		
执行主编	鲁明泓		
副 主 编	郑江淮	贾良定	
编 辑	何 健		

主编的话

《南大商学评论》面世一年多来,得到同仁们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南京大学在经济管理类学科建设上又取得了新的重要突破。国家教育部批准我校正式建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为了配合该研究中心的建设,我们决定将《南大商学评论》的办刊方向逐步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上,希望各位同仁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立足于中国经验,提出问题,撰写有一定分量的、高质量的论文。

这些问题既可以是经济转型和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也可以是一般性理论问题。各位专家学者还可以从自己擅长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如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产业组织、企业等相关领域,探讨具体的转型和发展问题,各种研究方法都可以尝试,各种观点都可以在这里交锋。

欢迎赐稿,谢谢。



目录

1	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	热若尔·罗兰
23	道德风险、监控成本与合约选择	约翰·巴泽尔 孙永泉
39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的生产率	索玛琳·加罗蒙特·吉莱妮 华萍
63	产业结构、就业与经济增长	臧旭恒 孙文祥
79	技术冲击下的股价变动与经常账户调整 ——开放金融经济的动态均衡分析	孙 烽 孙 颖
93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新趋势 ——一个基于金融监管效用假说的解释	李宏瑾
116	中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的实证研究	夏新平 余明桂 汪宜霞
135	中国的商业银行 X-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孙会国 李泽广 吴立行
149	中国封闭式基金规模经济问题的面板数据分析	张宗成 罗 真
158	博弈规则与税的决定,兼释“黄宗羲定律”	鲁桂华

177 税收征管中的博弈行为研究 尚长风 殷国玺

187 转移支付的性质
——制度资本理论的应用研究 周阳敏

199 市场主体的自我价值感 高雷 殷树喜 任慧玉

213 知识经济社会中劳动价值论的新阐释
——读《新资本论纲要》有感 朱科敏

CONTENTS

- 1**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 **Gérard Roland**
-
- 23** Moral Hazard, Monitoring Cost,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s **Yoram Barzel and Wing Suen**
-
- 39** Real Exchange Rate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Sylviane Guillaumont Jeanneney and Ping Hua**
-
- 63**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Zang Xuheng and Sun Wenxiang**
-
- 79** Dynamics of Stock Price and Current Account under Technical Impact
—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Open Finance Economy **Sun Feng and Sun Ying**
-
- 93** The New Trend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Utility Hypothesis **Li Hongjin**
-
- 116**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Func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Evidence from China **Xia Xinping, Yu Minggui and Wang Yixia**
-
- 135** China Commercial Bank's X-Efficiency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Sun Huiguo, Li Zeguang and Wu Lixing**
-
- 149** The Economies of Scale for China's Closed-end Funds: A Panel Data Analysis **Zhang Zongcheng and Luo Zhen**
-

158 Rule of Game, Determination of Tax, An interpretation
of Huang Zongxi's Law **Lu Guihua**

177 Study on Game Behavior in Taxation
Shang Changfeng and Yin Guoxi

187 The Nature of Transfer Payments
—— Applying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ory
Zhou Yangmin

199 Self is Never Neutral: Why Do Economic Agents Behave
Irrationally? **Gao Lei, Yin Shuxi and Ren Huiyu**

213 The New Explanation of Labor Value Theory in Society of
Knowledge Economy
—— Study on *Syllabus of New Capital Theory* **Zhu Keming**

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

热若尔·罗兰*

【摘要】 本文将制度分为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缓慢演进制度的典型就是“文化”，它包括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规则等。而政治制度则是迅捷变革制度的代表，它不一定经常变化、但变化起来可能非常迅速——有时甚至在一夜之间发生。本文的研究表明，迅捷变革制度与缓慢演进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将制度变迁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及何时发生）阐述清楚。本文的分析旨在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制度移植会面临各种困难，而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对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有益的。

【关键词】 迅捷变革 缓慢演进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对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条件的理解，正日渐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1776年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时所提出的问题。几十年来，有关市场和组织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比较，一直是整个一般均衡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坍塌，它的重要性也日益消退。最近，由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

* 热若尔·罗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电子邮件：groland@econ.berkeley.edu。
感谢作者欣然同意本刊翻译并发表该文，原文参见作者个人主页——译者注。

使得“亚当·斯密问题”再度复兴。例如,为什么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第一个10年表现如此糟糕,而中国在20多年来的整个转型期间都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曾是20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一的阿根廷,其经济几近崩溃?为什么“亚洲虎”能实现成功的经济起飞,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却挣扎在痛苦、战争和疾病的边缘,经济了无起色?

亚当·斯密的问题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史和转型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英国能获得早期的成功?当英国工业化时西班牙却落后了?应该如何解释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格申克龙(Gerschenkron), 1962),以及埃及和前土耳其帝国大部分地区的“现代化挫折”?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挖掘历史才能回答。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既为检验传统经济理论提供了平台,又为探讨成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条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现实中并不理想,它暴露出的一些弱点,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见罗兰,2002)。这些经济转型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采取了相当不同的发展战略,但却创造了“经济奇迹”。

亚当·斯密问题的复兴,是与经济学中制度学派支持者的日渐增多分不开的(诺思 1990;威廉姆森 1975、1985;及他们的其他著作)。正如尼克松所言,“现在我们都是制度主义者”。但是,到目前为止,正如同有很多教派一样,有太多关于新制度主义典籍的解释。制度意味着什么?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哪些制度?这些制度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是否存在一套最优的制度?抑或这种最优制度会因国家而异?最优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引进?制度变迁是怎样发生的?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改进它的制度?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概念框架,以推进这方面研究。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对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的文献进行回顾,而是沿着这一方向对已有的成果进行讨论。本文首先对制度的各种分类进行了回顾,然后提出一个新的分类方法,以便为理解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度变迁提供一个研究基础。本文对不同制度的区分,是依据制度变迁是缓慢连续的还是迅速不规则的。我们称前者为缓慢演进的制度,称后者为迅捷变革的制度。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化,包括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规则等,就属于前者。文化的演进与技术、科学知识的演进是紧密相连的,而技术和科学知识对经济增长是无疑极为重要的。与文化一样,技术的演进也是缓慢而连续的,虽然速度可能不同。

迅捷变革的制度不一定经常变化,但变化起来可能会非常迅速——有时甚至在一夜之间发生,政治制度就属于这种。本文对迅捷变革制度与缓慢演进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这有助于阐明制度变迁问题(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及何时发生)。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假设命题,例如关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制度移植会面临的困难,并在最后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系统中存在着无数的制度。当经济学家们试图了解其中哪些制度会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相关时,他们首先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制度进行分类。

1. 制度意味着什么?

要对制度进行分类,人们首先要问“制度是什么”?诺思(1990)认为制度是由社会“游戏规则”对人类行为强加的限制,即“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限制”。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尤其是它将社会规则、社会信仰、价值体系所强加的限制也包括在内。这样,在诺思看来,在解释增长和发展时,将“制度”和“文化”区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因果机制就没有意义,它们都属于制度性原因。然而,诺思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之外。例如,他认为银行属于组织而不是制度,但银行体系是由制度体系(与金融体系相关的法律和规则)形成的。

经济学家们将制度分为两类模式:一类是(按照诺思的观点)外生给定的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另一类是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内生的、自我执行的规则(青木昌彦(Aoki),2001;格雷夫(Greif),1993、1994)。如果强加约束无法执行,这样的制度将没有任何意义。外生模式中,制度执行(经常是暗含地)依赖于第三方。但这种模式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第三方的执行权力来源于何处,第三方执行规则的激励又是什么等。相对来说,青木昌彦(2001)巧妙地将制度作为内生的、自我执行的规则,虽然并非只为回避执行问题,但当论及诸如合约执行这样较简单的问题时,这一方法便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在很多时候,需要将这些自我执行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大的制度集群。这样,一般均衡方法就显得相当艰巨复杂。当我们对某些特定制度进行局部均衡分析时,将制度看作外生的,弄清楚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就已足够。

为避免引起语义混淆,本文以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为研究的起点。接下来(也可能是更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制度进行分类。一定的分类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一个经济系统,就必须用一个概念框架来理解系统中运作着的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作用。

2. 制度的分类方法

(1) 功能视角

第一种是经济学家们经常采用的功能型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服从于实现

有效签约和投资的需要。在签订合约时,我们需要产权做保障;在执行合约时,我们需要破产法和法庭做后盾;要保护投资安全,我们需要金融市场和机构;要获得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供给,我们需要政府部门,如此等等。在功能型分类方法下,每种特定的制度都对应于一种特定的需要。可以说,对制度的这种分类视角是非常直观和简单的。

然而,这一方法并非没有问题。首先,现有的一些制度并不能从它们所满足的需要中直接推出。例如,世界上有不同的破产法,那么功能型分类观如何解释这种多样性呢?它充其量只能借助于一些理论,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安排不同的最优破产法。例如,如果行为人厌恶风险,缺乏企业家精神,那么破产法就不宜对失败的企业家进行过重的惩罚。反之,如果行为偏好风险,容易欺诈,那么破产法应该对债务人进行严厉的惩罚。但是,这一分类观仍不足以阐释服从于相同目的的不同制度间的选择问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制度处于无效状态。其次,除了满足特定需要的个别制度的平均状态以外,这种视角无法对制度体系进行更多的论述,它不能告诉我们制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2) 宏观体系视角

第二种是宏观系统型分类方法。持这种分类观的学者首先对各种不同的制度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他们的描述从一般制度(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到特定的具体制度,例如,政治制度包括政体、选举规则、立法商议规则和联邦制的等级等。这种分类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制度的作用,有助于进行比较制度分析,而比较制度分析是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实际上,对制度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扩展型博弈,它不是任意给定的,而是建立在对制度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的。例如,为理解总统制民主与议会制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我们需要以不同政治体制的宪法特征为基础来建立一个扩展型博弈(如帕森(Persson),罗兰和塔伯里尼(Tabellini),2000)。该博弈的均衡结果会表明哪一部分制度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哪一部分制度不相关,不相关的是那些不会影响博弈均衡的制度。因此,运用博弈论工具来区别相关制度和不相干制度,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①。

这种分类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制度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形成制度体系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例如,近来的研究强调了普通法国家与成文法国家制度体系的差异(拉波塔(La Porta)等,1998a、1999b、1999、2000)、金融体系中证券融资导向与银行融资导向的差异(例如迈耶尔(Mayer),1987;伯克劳夫,1990)、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差异(帕森等,2000)、选举规则的差异(例如利泽瑞(Lizzeri)和珀西科(Persico),2001;帕森和塔伯里尼,1999;米雷西费瑞提(Milesi-Ferretti)等,2002;帕森等,2003)、联邦政府与集

^① 当然,倘若没有一个正式模型能考虑到所有潜在相关因素,那么这这也是一个实证问题。

权政府的差异(温格斯特(Weingast), 1995; 蔡洪滨(Cai)和崔斯曼(Treisman), 2001)及民主与独裁的差异(阿斯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 即将发表的论文)。

制度体系内部不同制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这就提出了制度体系内特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例如,旨在促进市场竞争的反托拉斯法和管理激励制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激励制度和产权之间、社会规则和法律安排之间、公司治理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之间的互动又如何? 劳动力市场制度与社会保障体制之间是何关系? 经济制度又怎样与选举规则及其他政治体制相关联? 这些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似乎使我们更难理解制度。因为我们不仅要了解大量现实世界的制度,而且要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者似乎极其复杂。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例如,科尔奈(Kornai, 1995)指出,旨在配置资源和形成所有权的各种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连贯性。一般来说,制度体系并不是一个模块化的结构,在模块化结构中,一个模块可以轻易地被另一个模块所取代。如果那样的话,“制度采集”就好像在超市购物。一般来说,制度会形成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一项制度都与其它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一个连贯的制度体系。在许多时候,进行制度替代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扰乱制度间的这种连贯性。当制度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补时,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最优改革战略的讨论中,制度的互补性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①。但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并不是惟一的例子。因为这种制度的连贯性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改革会如此艰难。日本的经济衰退已有 10 年之久,但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制度变革,那些有意改革的政治家们似乎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制度互补性的客观存在表明,研究者们应该对制度体系进行分析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国家进行分类。埃文斯(Evans, 1989)首先将制度分为“掠夺型”制度和“发展型”制度。阿斯莫格鲁等(2002)和其他一些学者(例如施莱弗(Shleifer)和维什尼(Vishny), 1999)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坚持了这一方向。在掠夺型制度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国家通常但并不一定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少数人运用权力剥夺经济行为人,从而降低了后者从事投资和生产的动力。与之相反的,发展型制度则向私人部门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物品和投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这就是迄今

① 这可能导致一些学者,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认为“大爆炸式”的转型,即所有的制度都尽可能快地同时转变,是改革的惟一路径。但是,制度的互补性并不能排除某些渐进式的改革。实际上,正如我在相关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见罗兰, 2000),渐进式战略可能更理想,正如中国经验所展示的。制度的互补性表明,转型过程中改革的次序选择最为重要。经济转型类似于更换一架正处于飞行途中的飞机的发动机。

为止经济学家们所发现的二者间最重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这一区别有多重要,它都是以产出为基础的,并且它无法识别出特定的相关制度。掠夺型制度是什么?发展型制度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导致各国经济增长呈现显著差异的主要制度机制是什么?在关于产权安全性的抽样调查中,由于抽样对象只局限于商人和经济类行为人,这样的实证研究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研究不仅十分主观和不准确,而且,它很难区别糟糕的制度(原因)和糟糕的经济绩效(结果)。从政策层面看,对导致掠夺型制度和发展型制度的机制的识别是极为重要的。掠夺型制度在本质上是否是腐败官僚为强取贿赂而实施多重管制的产物?它们是否是政府和官僚内部缺乏足够分权的结果?它们是否与文化、教育和官员的素质有关?显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带来不同的政策结论,从而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世界范围内的制度体系。

实证研究中一个主要的难题,就是如何理顺下列不同制度的相对重要性——法制和执法的质量、官员的素质和廉正程度、政体、选举规则和联邦制的等级、社会资本、社会规则及价值观。理论上,我们能够测算不同制度的作用及一个制度子系统的共同影响,但在实际中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首先,如前所述,一些制度是高度相关的。但这个问题又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可以运用因素分析法来处理大量的独立变量。有人甚至认为因素分析在制度实证研究中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制度变量的识别对制度体系的进一步概念化大有裨益。难的是如何识别,因为制度通常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其他相关制度的产物。例如究竟是法律安排产生社会规则,还是相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计量方面有相当的技能和创新来找到一些适当的方法。

3. 制度变迁和制度滞留

(1) 功能视角的缺陷

我们发现在制度分类中,功能型分类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但在理解制度变迁时,它的缺陷也是最大的。功能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必定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这种环境变化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功能。但它无法说明变迁发生或不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它更像是拉马克学说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是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变迁(这与达尔文关于基因突变是任意的观点是相反的,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机制使最适者生存)。尽管功能主义最终受到了批评,并且遭到了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质疑(如,厄尔斯特(Elster),1982),但在经济学界,它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活力,具有从马克思到格申克龙的悠久传统。在现代经济学中,功能主义的解释也获得了一些支持(尤其是与芝加哥学派相关的),这些支持论断认为经济行为人可以通过进行有效谈判创造出有效的制度。制度因此被看成某种科斯谈判的结果(见阿斯莫格鲁,2002)。因此,一般来说,制度既是有效的,也是能适应现有的社会和

经济环境的。

（2）无效制度的滞留

几十年前，奥尔森（Olson, 1972）通过强调大集团的集体行动问题，对“制度是有效科斯谈判结果”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奥尔森观点与芝加哥观点完全相反，在前者看来，制度变迁中的利益相关者难以组织起来协调共同行动，因此使无效制度得以长时间存在。然而，集体行动问题并非无效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在这方面，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2000、2001、2003）突出强调了政府面临的承诺问题。在他们看来，由于通常没有一个第三方来执行社会的各利益集团间的协议，因此任何拥有权力的集团，都只会为自身的利益而行使权力。那么无效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那些拥有权力的统治者们就不会放弃权力，因为他们相信制度变迁的受益者们不会对受损者进行补偿。这样，由于社会冲突和承诺缺失的联合效应，无效制度得以继续存在。例如俄罗斯沙皇政权和奥匈帝国就比德意志更坚决抵制变革，对于前者来说，尽管贵族的土地利益保存完好，但他们没有工商利益，因此资产阶级被视为是对统治者权力的威胁（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2002）。而德意志的情况正好相反，拿破仑战争彻底摧毁了地主贵族的势力，因此普鲁士的精英们经历了产业利益与土地利益相互渗透的过程。

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些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在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模型中，不时发生的外部随机事件会导致权力移转至社会特定集团手中。工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分散的，但在危机中，他们是可以联合起来并推翻现有政权的。他们的模型表明，有一点非常重要，即社会集团的组织能力部分地取决于现有制度。独裁国家倾向于对权力外社会集团的集体行动进行系统性压制，但民主国家则为贫困的大多数人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他们可以通过政治竞争和选举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这部分解释了 20 世纪之交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为何意义如此深远，因为对穷人而言，普选权象征着在特别时刻例如总罢工时保持动力的制度变革，这时集体行动问题可以瞬间解决。而对富人而言，选举权是一种承诺向穷人再分配和转移权力的方式，同时还可以避免革命发生（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2000）。

从这部分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制度影响社会集团解决他们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因此，制度变迁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冲突的目标。

三

理解制度变迁的框架

要将制度视为一个体系，我们就需要理解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作用。此外，

我们还必须有一种理解制度变迁的方法。为在这一方向上有所突破,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分类方法,即根据制度变迁的快慢和连续与否对其进行划分。

1. 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

首先,本文认为缓慢演进的制度和迅捷变革的制度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一般呈现为缓慢的、递增的和持续的变化,而后者则呈现为迅捷的、间断的大幅变化。例如,政治制度就有可能发生大幅度的、集中性的、决定性变化。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制度是快速演进的制度,因为当革命爆发时,政治制度的改变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相反,社会规则是一种典型的缓慢演进的制度。历史地看,尽管有些社会规则和价值观也能迅速改变(例如社会对烟草的容忍),但总的来说,社会规则和价值观是缓慢演进的。甚至有个别社会规则的演进速度相当慢,如对死刑和受贿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一些规则是根植于宗教信仰的,而宗教的基本规范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都甚少改变。世界上几大宗教已经促成了或正在促成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偏好: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该对别人的行为方式形成怎样的预期?虽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相反例证,但若将价值观和社会规则视为一个整体,它们是缓慢演进的。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分析为什么社会规则或价值观的变动缓慢,而仅仅是描述这一事实。然而值得考虑的是,当局的决策是否可以改变制度。法律体系的变动要快于社会规则,但慢于政治制度。一部法律能在一夜之间改动,但整个法律体系很少能像政治制度如选举规则那样迅速变化。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效率和执行,还取决于它们的合理程度和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取决于当事人的预期。因此法律制度与社会规则非常相似,只是它的奖惩安排被汇编成了法典并且变化速度比社会规则更快,而社会规则的变动是不能由法令决定的。

至于哪些制度变迁具有连续性哪些具有间断性,本文认为相对于社会规则,政治制度的变革具有间断性,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保持不变,然后突然变化。而社会规则的改变则趋于连续,尽管速度缓慢^①。同样的,法律安排也介于二者之间。变革的规模和变革的持续或间断程度并非是同一概念,但缓慢演进和迅捷变革制度的这两个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例如如果变革的步伐很大,但并不经常发生,那么变革就是间断的。

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按照定义,缓慢演进的制度会影响迅捷变革的制度,因为前者在一定时间几乎不变,而后者

^① 这并不意味着缓慢演进制度的变化速度是固定的,在某个时期它的变化速度可能相对更快。例如,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和伊斯兰教辖区建立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快了。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千百万人此后就被迫急速地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则是不正确的。这过高的估计了国家的力量,事实上直到20世纪(或许是19世纪后期),政府才取得了极权统治地位。